

影响我们阅读的“年度榜单”

年底是总结当年好书的好时机，全面的梳理确实可以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，也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份购书看书的参考。与此同时，年度好书榜、排行榜自身如何突破个人、地域乃至专业的限制，平衡普及化和专业性之间的关系，始终是一个难题。栏目主持人李黎就此话题与《当代》杂志执行主编、著名评论家徐晨亮展开对谈。

对话

1

李黎：每到年底，好书榜、排行榜都会涌现出来。我觉得这样的年度总结是必要的，让人感觉有一种新年的、春节的喜悦，榜单散发出浓浓的“年货”意味。这里，我的角色是普通读者，是消费者、买书的人。自2006年至今，我每年买书的量都在500册以上，这其中出于对榜单的信任，或者被榜单的密集轰炸和热情影响的，占比非常大。你个人的购书藏书和排行榜之间大概是什么关系？

徐晨亮：听到500册这个数字，我想赞叹家人对你的宽容和支持，以我亲身体会，先不谈投入，单就藏书占据的物理空间，真的会影响生活质量。在我沉迷购书的“原始积累”阶段，曾结识一位长辈，因为家人的忍无可忍只好借用单位的一间小库房存放藏书，随他参观那个人防工事般的书库时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心里哆嗦了一下。可能对一类人来说，购书藏书已是一种生活习惯，用那位长辈家乡的方言形容，叫“淫书癖”。沾染此癖者，我猜测，多半也是书单、书榜的“重度消费者”。身为“病友”，你说的这些心理我完全理解，看到新的榜单我也都会第一时间翻阅，发现之前没留意到的新书，顺手就加到网店购物车或豆瓣的“想读”列表里。但重度患者在全部购书读者中所占的比例，显然不会很高，而且沾染“淫书癖”越久者，购书的品味也会越刁钻，越不容易被煽动，更多是把榜单作为过滤信息的渠道。而位于金字塔基座的大多数普通读者，他们会如何看待年终盘点时涌现的各种榜单？好书榜在我们今天的阅读生活当中又有哪些不同的意义？这些问题确实值得讨论。

李黎：确实，作为出版从业者，我们看待好书榜、排行榜，还有年选，事实上已经很难只是读者的身份，你更是参与了多个榜单的提名和终审。我的整体感受是：还远远不够！作为一个行业中人，我期待比现在看到的更多，五倍甚至十倍以上才对。因为任何事物想要成立，必须有个坚实的基础，有巨大数量的支撑，很难想象一年终了时只有两三个榜单。多到一定程度，首先可以不遗漏佳作，其次被广泛认可的作品/图书也会得到反复确认。不知道你是否认可这一点？

徐晨亮：你开始联系我说要谈排行榜的话题，我第一反应以为是要讨论目前榜单是否过多过滥，没想到你的整体感受是“还远远不够”。我自己的观察，目前的排行榜从数量看并不少。针对文学作品的部分，印象里最早的是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，始于2000年；我目前供职的《当代》杂志从2004年启动年度长篇评选，最近也要公布2021年度长篇五佳；《北京文学》《收获》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等杂志每年会发布自己的榜单，有些我曾参与推荐或评选。关于图书的综合榜单更多，不少重要的行业报刊、大众媒体与文化网站都会推出好书月榜、季度榜与年度榜。相关机构的榜单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“中国好书”最具代表性，每年联合央视发布的“中国好书”年度榜，目前是

对实际销量拉动最明显的好书榜单，我们都在出版业供职，这也不算什么行业机密。此外还有“深圳读书月”的年度好书评选，以及一些书店推出的年度书单，如单向街的“书店文学奖”，“豆瓣”的年度榜单比较特别，值得单独讨论。我这两年受邀参与的“阅文·探照灯好书”定位是“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”的榜单。近年还有一个风潮，很多出版社或出版公司也会评出自己的年度好书榜。如此粗略盘点，真是让人有些眼花缭乱。

可为什么会让人产生“还远远不够”的感觉呢，我想应该这样说，目前的好书榜，“多”的只是名目和数量，“多样性”还体现得不足。从我熟悉的文学领域看，选刊选本、各种奖项和排行榜、年度书单，这些也是文学批评的方式，换句话说都是一种叙事，希望从纷乱嘈杂的现场中发现、建立某种秩序与标准。但不同的叙事背后分别基于何种逻辑，似乎并不清晰，有太多榜单的评选范围相同、流程相近，对评选标准的表述也大同小异，仅仅是评选结果略有差别。这样的局面显然值得反思。

李黎：我感觉目前的排行榜不够多，一个很大原因可能还是读书的人不够多，其中的高手、权威自然也就少，以至于很多的榜单，背后的评选者有所重复。评委如果过于广泛，可能会失去权威性，但过于集中，初选的范围会小，这是个两难的问题。相信很多主办方也有把评委全部更换一遍的冲动，可实际操作下来又发现难以绕开一些专家、书评人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待？

徐晨亮：你说的涉及榜单评选机制的问题。上面列举的榜单，有些比较强调专业立场和权威性，邀请的都是主办方认定的行业内专家，评委阵容的挑选空间自然不会很大；有些则会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加入大众参与的环节，但为了过滤掉网络刷票的影响，最终结果基本还是由终评委主导。不管一个榜单怎样设计入选书目推荐、初评、复评、终审的流程和范围，最终仍是数量有限的评委替读者做出选择。我自己每次参与这些评选，都感觉压力巨大。这里面有很多让人纠结之处，比如业内标准和大众尺度、私人评判与公众意义等等如何平衡，不同榜单的评委会根据主办方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导向。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，前两年有文学编辑撰文批评各种文学排行榜的泛滥，认为基于投票排名取得的共识，都是博弈与妥协的结果，其保守与中庸可想而知，还有很多榜单背后的诉求不过是抢占地盘、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威甚至夹带私货。这样的批评可谓激烈，事实上我接触的评选主办方更多还是出于公心，但上述意见指出的问题还是值得反思的。如果评委团的阅读趣味、关注视野、审美尺度太相近，评出的结果显然不具代表性说服力；但评委各自的标准相差太远，通过取“最大公约数”的方式得出的结果，确实可能是平庸的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困惑。最近看到一些榜单，在公布最终结果之外，也会同时发布评委在“共识”之外的个人选择，这或许算是具有操作性的方案。

2

李黎：一个榜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，我有时候很疑惑，到底是普遍看好的作品/图书，可以代表这个阶段，还是一闪而过的才是当下的代表作（而被普遍看好的，可能成为经典，也可能成为时间线拉长之后的流星）。此外还有个疑惑是：能取得普遍共识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少了，这一点在原创文学领域似乎很突出，它背后原因，可能是一代作家老去而新的大作家相对欠缺，也可能是当下被注入了太多的科技、娱乐等元素，文学走过了“黄金时代”。当然也可能只是我的错觉，保不齐后面几年巨著不断。作为多个年终榜单的评委之一，你怎么看待频繁出现的以及一闪而过的“两极分化”？

徐晨亮：说到“巨著”与“流星”的选择，前些年有些大众媒体评选的好书榜，上榜的都是社科类的大部头引进版作品，我看到名单，疑惑有多少读者愿意阅读这些“巨著”。有次碰到某榜单的评委，聊天时发现我们共同喜爱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雄雄的一系列短小精悍、雅俗共赏的作品，便问他为何不给那个榜单推荐这样的更适合入门的小书，他的回复是认为分量不够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定位于推荐大众阅读的书单，还是应多考虑作品的阅读门槛。此外，前几年我主编《中华文学选刊》杂志策划过一个年度阅读推荐的专题，主题叫“炬火与微光”，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在光焰四射的现象级作品之外，也能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发掘在前沿、潜层与偏僻处闪烁的萤火。或许这样的流星与萤火，对于特定读者也会有启发价值。

李黎：我喜欢看“一个人的排行榜”和细分的排行榜，比如今年豆瓣做的分类榜单。这些排行榜应该是经历了较为充分的阅读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榜单所推荐的书，因为承载了更多个人、群体喜好，销售往往也很一般，并没有被更多的人读到。但榜单更不能以销售为依据，因为销售这件事过于复杂和微妙，太多的作品之外的因素，销售和阅读、质量等甚至没有关系。这里就牵扯出一个大问题，对我们这些出版从业者非常终极的问题：什么是好书？

徐晨亮：我跟你的感觉一致，有时候“一个人的排行榜”或者切口较小的榜单，如最近张莉教授做的“女性文学排行榜”或文景公司做的“历史写作”年度榜，会显得更有意思。谈到豆瓣分类榜单，我自己也非常关注，这个榜单与所谓专家榜以及市场销量榜的重复和差异，值得好好研究。前不久因为写一篇关于类型文学的文章，比较过豆瓣榜单与开卷监控销量榜，发现对比很明显。比如基于读者评分和评价人数计算得出的“豆瓣科幻小说Top100”榜单上，位居首位的是刘慈欣《三体》，众所周知此书放在整体图书市场上也堪称“爆款”。第三位是阿西莫夫的经典作品《银河帝国：基地七部曲》，这一系列有多种版本，其中开卷数据销量最高的读客版《银河帝国1：基地》，单这一本就超过百万册。位居第四位的是阿瑟·克拉克的《“太空漫游”四部曲》，多种版本的开卷数据累计超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浒群星闪耀时》。

VS



徐晨亮

1979年生于天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执行主编。曾任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执行主编。

过二十万册。第十五位的作品《少数派报告》，作者是被科幻粉丝昵称为PKD的菲利普·K.迪克，累计销量约两万册。位居第十七位的弗诺·文奇《天渊》，曾击败《哈利·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，荣获2000年度科幻雨果奖，累计销量约八千册，与《银河帝国1：基地》相差达百倍之多。对比“豆瓣推理小说Top100”榜单与开卷数据，也能发现类似的状况。榜单上仅次于“国民读物”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，排名第二的是东野圭吾的大热之作《白夜行》，此书开卷监控销量高达四百万册。排名第四的伊坂幸太郎《金色梦乡》，开卷数据约十六万册。第八位的《络新妇之理》，作者是具有极高人气的日本推理作家京极夏彦，上下两册销量相加为三万册。再举一位日本推理作家，三津田信三“刀城言耶系列”中的《首无·作祟之物》，豆瓣榜单名列第十一位，而开卷监控销量约六千册。为什么同为豆瓣读者从海量科幻、推理小说中选出的分类榜单前二十名作品，即粉丝口中的“神作”，销量却有十倍百倍的差距呢？很多时候作为出版行业中人，判断何为好书，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，必须考虑“读者”“市场”的因素，但“读者”“市场”并不是抽象的指标，或者说每个特定类型内作品的读者群分布更像一条光谱，其规模可分别用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来计算。由其中引申，我理解的“好书”标准也不是静态的。有些书只有一千人会读，无论怎样推广读者也无法增加；而有些因传播途径的限制，原本只被一千人叫好，通过有效传播后，能被一万人所喜爱，我觉得就可以算相对的“好书”。那么一份好书榜若能发现、推广更多这种意义上的“好书”，无疑更具价值。

3

李黎：从我们从事的职业出发，书评人，还有阅读推广人等等可能接触更多，你理想中的书评人有哪些，有什么特质？

徐晨亮：具体的名单就不再这里列了吧。我只说几个标准，理想中的书评人可以是特定领域的专家，但不能偏食，而应该是杂食动物；此外，他应该是个破壁者，能打破专业或审美的壁垒，让一本书的价值被更多人看到。最后，一个理想中的书评人应该像李黎这样，每年自己花钱购买足够数量的图书，而非仰赖作者或出版社的赠书，只有自己买书，才能更好地体会读者的心情。

李黎：2021年度的原创文学，你心目中的排行榜是什么？

徐晨亮：前不久作为某一好书奖评委，列出了一份个人推荐书目，姑且列在这里吧，不能算是排行榜，而且因为各类文学好书榜更关注长篇小说，我的这份推荐列出的只是中短篇小说集与文集：李修文《诗来见我》、东君《面孔》、杨本芬《浮水》、孙频《以鸟兽之名》、张惠雯《飞鸟和池鱼》、李浩《飞翔故事集》、糖匪《奥德赛博》、李益《羊呆住了》、黄小峰《古画新品录——一部眼睛的历史》、汪天艾《自我的幻觉学》。